



钱理群作品精编

钱理群

# 漂泊的家园

——家人与乡人篇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钱理群作品精编

钱理群



# 漂泊的家园

——家人与乡人篇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漂泊的家园：家人与乡人篇 / 钱理群著. —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6.9  
(钱理群作品精编)  
ISBN 978 - 7 - 108 - 05449 - 4

I. ①漂… II. ①钱…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8194 号

责任编辑 卫 纯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

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

字 数 273 千字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4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 前 言

人是不能没有精神家园的；我有幸有两个精神家园。

首先是我出身的钱氏家族。在我的感受里，我和家人之间，不仅有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更有一种精神的交融。我曾以“对内谦让，对外奉献”来概括钱氏家风与传统，在潜移默化中构成了我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对我的影响更为深刻的，是家庭在近现当代社会的历史巨变中的曲折命运。我的家庭在抗日战争和1949年后经历了两次分离，最终导致了“生不团圆，死各一方”的大悲剧。我们家庭集中了中国近现当代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外祖父是晚清维新派乡绅，父亲是作为亲美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入国民党体制，三哥则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大哥是一个爱国的自然科学家，晚年又加入了共产党，四哥与二姐学生时代就参加革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而我们最小的三个则完全是新中国培养的。这样，我们的家庭，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高度缩影；因此，我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所面对的就不是与己无关的对象，某种程度上我是在研究我的家族、家庭，或者说是在研究自己。而且家人政治选择的巨大差异与内在的相通，又决定了我的研究立场的复杂性与模糊性：我对父辈与兄长的不同选择都有同情的理解，更自觉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最感自豪的是，我还有第二故乡贵州。我从1960年被发放到那里，度过了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九岁的青春时光，经历了“自然灾害”

和“文化大革命”的大劫难。我曾说过，在我人生道路最艰难的岁月里，是贵州这块大地和父老乡亲，以其宽厚的胸怀接纳了我，我也和他们一起经受了生命的磨难，而建立起了永远隔不断的精神上的血缘关系。具体地说，“是贵州的真山真水养育了我的赤子之心；和贵州真人的交往，培育了我的堂·吉诃德气；‘文化大革命’中的摸爬滚打，练就了我的现实关怀，民间情怀，底层眼光；十八年的沉潜读书，更是奠定了我的治学根基和底气”。（《漂泊的家园·后记》）

我在 1978 年离开贵州，回到北大，依然保持了与贵州乡人的联系。于是，我就拥有了北大与贵州两大精神基地，可以自由地出入于高层与底层、中心与边缘、精英与草根之间，我认为这是我的人生和学术的最大财富。在退休后，逐渐远离了越来越陌生的北大，贵州的乡人就更成了精神的依靠。可以说，我的晚年一直处于家人与乡人的爱的温馨的包围之中，这真是难得的福分。我也以同样的温馨为他们造影，以表达我的感激与怀念之情。这同时也是历史的书写：所有的家人与乡人都是 20 世纪中国巨变中的典型人物。

# 目 录

前 言……1

## 辑一 生命之根

在项兰生铜像揭幕式上的讲话……3

哦，你是我的父亲……6

钱天鹤先生的农业思想及其对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贡献……11

这也是一种坚忍与伟大……37

悼大姐……40

哭好哥……45

心系黄河(节选)……53

钱宁学术思想与教育思想概述……86

龚姐，一路走好……103

无以表达的悔恨……108

愿你永远是年轻的革命者……112

## 辑二 脚下土地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125
抗战时期贵州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历史性相遇	184
正史掩不住的光耀	200
永远压在心上的坟	206
我读戴明贤其书其人	209
我的怀念温馨而恒久	216
痛悼同代人的“死”	219
给亡友尚沸	222
我们共同的坚守和追求	225
民间思想者：我的精神兄弟	245
“土地里长出的散文”	254
贵州发展道路的遐想	280
我的关于地方院校教育的畅想与空谈	299
屯堡文化研究的动力、方法、组织与困惑	312
好人联合起来做一件好事	323
附录一：钱理群著作目录	333
附录二：钱理群编纂目录	339

辑一

生命之根



# 在项兰生铜像揭幕式上的讲话

(外祖父项兰生先生是杭州七中的前身浙江安定学堂的创办人，2011年学校为他建造铜像。这是我为表弟项湜五代拟的讲话词。这篇讲稿，得到了四哥钱树柏的认可与赞扬，以为是对外祖父的公正评价。现在四哥也远离我们而去，发表此文，也算是对四哥的纪念。)

尊敬的杭州市教委，杭州七中领导、老师和同学们：

首先，我代表项兰生祖父的六个孙子，六个孙女，以及九个三十五世子女，五个三十六世子女，以及项兰生的外甥辈钱氏子女，感谢市教委与七中在校园建造项兰生铜像，这是我们项、钱两家的光荣，对我们后代子孙也是一个巨大的激励与教育。我们一定努力学习祖父的优秀品质，并继续发扬光大，以告慰祖父在天之灵。

我的父亲项仲雍是祖父的长子，我因此应该算是长孙。祖父在世时，我的年龄太小，没有留下太多的记忆，但也有模糊的印象，一是祖父家里的书极多，二是祖父言语不多，总是在那里读书、写字，因此，祖父在我心中始终是一位严正、严肃的知识分子，让人肃然起敬。我是近年有机会读到祖父的《自订年谱》，才对祖父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下面，就谈谈我的一些认识。我认为，祖父项兰生先生一生有三件大事，特别值得纪念，而且这是最能体现他的精神的。

第一，祖父是晚清著名的维新派思想家王韬的学生，祖父的《自订年谱》里特地记录了老师对他的三点教诲：一是“对于八股文不必看得太重，务必多读史书”，二是“认识世界大势，以此为立身行己的基础”，三是“功名问题，要坚决放弃”。在我看来，这三点是影响了祖父一生的发展，而且是显示了他那一代人的特点的。这是具有世界眼光的开放的一代，这是具有改革精神的一代，这是一心为国为民，毫无个人功名之心的一代，因此，这也是开时代风气之先的一代人。我认为，应该把祖父创办七中的前身、当年的安定学堂，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认识，才显出其意义。所以他几乎在创办安定学堂的同时和前后，还参与了浙江高等学堂（今浙江大学）的创办，《杭州白话报》的创办，又担任浙路公司公务科长，开发浙江交通事业，最后，还是浙江兴业银行的创始人。无论是办大、中学校，办报纸，还是修公路，建银行，都是“第一个”，今天我们回顾与总结浙江的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是不能忘记祖父这一代先驱者的。作为个人，能够在这么广泛的领域都作出开创性的贡献，更值得钦羡。这不仅显示了过人的智慧和勤奋，更有过人的胆识。这一点，对今天的年轻的朋友，是应该有启示的。

第二，今年是辛亥革命胜利一百周年。祖父时任大清银行总行秘书官、上海大清银行代总办。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上海以后，历史的巨变自然造成了人心的浮动，居民纷纷到银行提款，掀起了挤兑风暴。祖父沉着应对，和各方联系，果断地调拨了大量货币，及时解救了危机，对稳定辛亥革命以后的上海局势起了很大作用。这应该算是祖父对辛亥革命的一大贡献吧。

第三，祖父后因不满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行业风气的颓败，年过五十就宣布退休，以保持一生的清正廉明。1947年上海的青年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反内战，反饥饿”运动，遭到国民党政府的

镇压，年已七十五的祖父，又和陈叔通等十位老人一起联名抗议，声援学生，当时是震动了整个上海的。由于不满意国民党的专制、腐败，祖父的子孙也纷纷走向革命。时任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的祖父的二子、我的二叔项叔翔和新四军秘密联系，提供经费和药品；孙子项淳一、外甥钱树柏参加了地下党；外甥女钱树榕加入了新四军，祖父一律不干预，不阻拦，客观上起到了保护作用。这都显示了祖父的深明大义，他一生都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前进的。这或许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 哦，你是我的父亲

这一两年，竟不断地写起追悼文章来——每一篇都偿还一笔精神的债务：给老师，给亡友，给……

最应该偿还的，留在最后。

我不知道该写什么，该怎样去写——我几乎无话可说，却又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

因为你留给我的记忆几乎一片空白。

因为我永远摆脱不了你，我的命运与你紧紧相连。

哦，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儿子。

明年某月某日——我甚至都说不出具体的时间——是你的诞辰百周年祭日；在这多雪的北方的早晨，坐在未名湖畔，我想着遥远的南国的海的那一边，端坐在冰冷的石座上的你，却无法想象，更不能具体地说出：你的容颜，你的声音，你的思想……你对于我，永远是一个陌生的存在，一个偿还不清的精神的债主！

多少次，我努力地想从记忆的坟墓里，挖掘出你的形象，但收获的永远只是印象的碎片：1948年的冬天，南京中山东路一家小吃店里，一个穿着长袍的沉默的中年人，带着长着圆圆的大脑袋的小男孩，在吃着什么——仿佛是汤圆，仿佛又不是，模糊不清了。男孩很快地吃完了，望着仍在慢吞细咽的中年人，中年人微微一笑，把自己碗里剩下的，一个个地夹到男孩的碗里，突然长叹了一声……

这唯一留下的瞬间记忆，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拍打，竟化作我生命中的永恒：父亲，你哪里知道，你的沉默，微笑，连同你的一声叹息，是怎样地让你的儿子千百遍地咀嚼，温暖着，又咬啮着他那颗破碎的失落的心！……

还有挂在墙上的你的巨幅画像，留在我的记忆里的，仍然是你的严肃的微笑。这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你亲自购置的南京武夷路22号小楼母亲的卧室里，你日夜陪伴着母亲，也时时从墙上望着我、哥哥和姐姐。我知道你在海峡那一边，却不怎么想念你——我们已经习惯于家庭生活中你的缺席；即使当年我们全家住在南京江苏路、中山东路的时候，你不是出差在外，就是和来往不绝的客人谈论公事，少有和家人闲谈的时候。但偶然瞥见墙上的你在对我微笑时，不知怎么的，我总有一种安宁感。“那是我的父亲，父亲。”我对自己说，同时有一股温馨袭上心头。但母亲却时时念着你，每逢过年过节，总要多摆几副碗筷——为你，也为远在异国的大哥和三哥。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了一种生命的沉重与悲凉，但也只是刹那的感觉，很快就忘了：那时候我还不懂人事。

待到你的画像从墙上取下，并且永远在家中消失时，我才开始感到了你的分量：你与我以及全家的命运息息相通。起初还是中学生的我只觉得奇怪，想去问母亲，看到她一脸愁容，却不敢开口。还是“新奶奶”——长住我们家的女佣，你一定记得的——悄悄告诉我，四哥（他是共产党员，在南京团市委工作）因为家里挂着你的像，与你划不清界限，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已经说不清当时的反应，仿佛觉得有些奇怪，又分明感到了一种精神的威压，而此后母亲死一般的沉默尤使我不安，从此，不祥的预感便笼罩着这个温馨的家庭。

考验终于临到我的头上。1953年，刚满十四岁的我，便提出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申请，这

在我们那一代是天经地义的归宿，仿佛到了十四岁，就应该、也必然成为青年团员。但我的申请，却遭到了拒绝，尽管当时我是全校老师、学生公认的品学兼优的模范学生。面对这晴天霹雳般的打击，一阵天旋地转以后，我顿时产生了低人一头的屈辱感，仿佛刹那间我从天之骄子变成了二等公民。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番情景：我的入团介绍人、也是我的好友，一脸严肃地正告我：必须从思想、政治与行动上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反革命？！”我差点大叫起来；我怎能把已经渗入记忆深处的严肃、沉静、微笑着的你，与在我的观念中早已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联系在一起？！在我这样的十四岁的中学生的心目中，父亲与革命，都同样神圣，现在却硬要在这两者中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未免过分残酷，我感到了掏心挖肺般的痛苦。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位好友，整整一个暑期，每天都要到家里来说服我；我知道，那是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他自己也怀着极大的真诚与热情，希望帮助我闯过这一关。他总是不等坐定，就急急忙忙地把该说的几句话说完，然后突然沉默下来，用急切的眼光望着我。我知道他想让我说什么，我也真想说出他想让我说的话，那样，我们俩都可以松一口气，卸下那对于我们来说是过于沉重的精神的负担，然后可以痛痛快快地去做我们愿意做的事——我的朋友当时正在狂热地学习作曲，我也正热心于作词，我们本是天然的合作者……但我却怎么也说不出来，只能怔怔地抱歉地望着他；他也呆望着我，似乎也怀着某种歉意。时间到了，他默默地站起来，我也默默地送他到家门口，空气沉重得令人窒息。我真想恳求他不要再来，但第二天他仍然来了，在同一个时刻，一分也不差。呵，父亲，你这时正在海峡的那边为台湾农业的振兴奔波，你当然不会想到，你竟使你的小儿子承受了这样的情感折磨！但我却因此而深深地怨恨你了。多少次望着那曾经挂过你的画像的白墙，我默默地想：要是父亲的形象也能像画

像一样永远消失，要是我根本没有这样的父亲，那该多好。呵，我竟敢否认自己父亲的存在，我这罪孽深重的儿子！我为自己的念头吓坏了……

从此，与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就成了我永远洗刷不清的罪名。我终于从北京流放到了贵州安顺，正是传说中的夜郎国的所在。在我简单的行囊中，有一张父亲的照片，这是我从母亲那里要来的。但我从不敢翻出来，仿佛看一眼本身就是一种犯罪；但又始终保留着，我知道那是我们父子间最后的精神联系。不管看与不看，“他”存在着，这就足以给我的越来越孤寂的心以某种慰藉了。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点慰藉竟使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化大革命”中，当红卫兵从我的箱底里翻出这张照片时，我再也逃脱不了反革命孝子贤孙的罪名。面对着红卫兵的质问，我无言以对。当时正盛行着“老子反动儿浑蛋”的革命逻辑，我也为自己的大胆（解放后几十年，还保留着父亲的照片）吓蒙了。我唯有低头、认罪、忏悔，说不上真诚还是不真诚，只恨不得割断一切社会联系（因为每一个联系都是一种罪恶），还有一个一无牵涉的“自己”。因此，当后来学校革命师生给我平反，将父亲的照片还给我时，我几乎是毫不迟疑地将它付之一炬——事情过去很久以后，我才惊讶自己当时的平静。记得有一位学生提出了异议，他问我：“儿子为什么不可以保留自己父亲的照片呢？”我望了他一眼，只觉得他的问题提得奇怪：我已经心如死灰，以为人世间早已无感情可言，更不说父子之情……

但我很快就受到了惩罚：当我得知父亲 1972 年在台北悄然去世时，我才猛然省悟，我做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我亲手烧毁了对我有着养育之恩的父亲的形象！呵，我这大逆不道的、罪恶深重的儿子！

尽管 70 年代末，旅居美国的三哥归国，又带来了父亲的照片，

我却再也不敢正视。我的眼前，永远晃动着那地狱般的图景：我亲手点燃的火，一点一点地吞食了我的父亲——他的沉思、微笑，连同他对我全部的爱和期待！……

我仿佛又听见了早已埋葬在童年记忆里的父亲的那一声叹息……  
哦，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儿子！

1991年12月